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名家译论·妙趣天成·鸿儒论道·指点迷津

口译理论概述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鲍 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口译理论概述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鲍 刚 著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译理论概述/鲍刚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1. 1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1-2855-7

I. ①口… II. ①鲍… III. ①口译-翻译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3712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c.com.cn

网 址/http://www.ctpc.com.cn

总 经 理/林国夫

出版策划/张高里

责任编辑/章婉凝

排 版/竹页图文

印 刷/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00×960毫米 1/16

印 张/17

版 次/2011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一次

印 数/1—3000

ISBN 978-7-5001-2855-7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口译组

- 法 语 Daniel Gile (AIIC 会员)
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
闫素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邵 炜 (AIIC 会员)
蔡小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日 语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 英 语 王恩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任 文 (四川大学)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江 红 (AIIC 会员)
宋亚菲 (广西大学)
陈 菁 (厦门大学)
张其帆 (AIIC 会员)
林超伦 (英国)
秦潞山 (AIIC 会员)
陶丽霞 (四川外语学院)
柴明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开宝 (上海交通大学)
Andrew C. Dawrant (AIIC 会员)

期待和展望

——《中译翻译文库》总序一

刘宓庆^①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文论家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又译“瓦特·本雅明”)写过一篇对西方翻译和翻译研究界影响很大的译论《译者的职责》(*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在本杰明看来,“职责”就是“task”。

① 刘宓庆,男,1939年11月出生,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任高级翻译;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2006年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翻译实务与理论研究,著有《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刘宓庆翻译散论》(以上图书均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以及《翻译美学理论》,共12种。刘宓庆在精心研究我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翻译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了现当代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是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又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学术界很受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刘宓庆的基本理论主张为:一、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二、中国特色译学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三、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四、中国译论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功能代偿”;五、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中最大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前四点基本理论主张上,尤其是第一、第三和第四点上。《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最大的特点和贡献在于:一、加强了整体性整合研究,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功能主义翻译观。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提出要加强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这两个系统开展,每个翻译学范畴的研究都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各专著在重点讨论某个具体的范畴时,也关注其他范畴的研究;而他的每部著作又都各有侧重。二、从本位和外位的角度,科学化、系统化地探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译学,为中国当代译学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这样,从世界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共性上,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认识;在个性上,结合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在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等方面进行研究,给予译者系统性、科学性的指导,并在这些范畴上给其他类型双语转换研究提供外位参照。

从本杰明的所指内涵来看，我基本上认同他的见解，但他所处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话语对象是欧洲的译者，话语背景也与今日之中国迥异。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翻译的“task”应该是一种“bounden task”，也就是“天职”（责无旁贷的任务）。这个题目，我最后再谈。下面，我先谈谈几个我认为对翻译研究至关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期待我国的翻译界加以审视、研究和改进。

一、翻译研究要摆脱“二元化”（Dualism）的认识论局限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提出来的哲学认识论命题；比较通俗或相近的提法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一分为二”、“二项并列式”等等。为便于叙述，这里我们将以上各式表述统称为“二元化”。“二元化”指的是概念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并列，如“正与反”、“是与非”、“阴与阳”、“黑与白”、“上与下”等等。按康德的解释，“二元”彼此以对对方的存在为条件；这就使二元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固有的互相矛盾”。有矛盾，就有内张力、有发展、有提升。

“二律背反”对不对？看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看到，用“二律背反”来归结、分析同类事物与归结、分析非同类事物的情况是不同的，必须善作个案分析。在非同类事物中，比如“天与地”、“神与形”、“言与意”、“神似与形似”等等，二元之间只存在一种关联关系，不是类属关系。这时，用“二律背反”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在诸如“神似”与“形似”之间就不存在既非“神似”又非“形似”的“中间带”。但在同类事物中，“二律背反”中的“二元”之间则不仅仅是关联关系，还存在一种类属关系，类属关系使“二律背反”中的“二元”之间出现广阔的“中间带”，从而使“背反”光谱化，二者之间的对立条件也复杂化。例如，在“生蜜桃”与“熟蜜桃”（“生熟背反”）之间，就有很多既不很生又不很熟的蜜桃。在非同类事物中，“二律背反”也好，“二元对立”也好，“一分为二”也好，都是“二元”存在的基本形态。但在同类事物中，二元之间除了基本形态以外，还有很多同类属的非基本形态。我们甚至可以说事物大多都是“二元存在的同类属非基本形态”。例如，“黑色”与“白色”之间就存在着不同色调（shade）的广阔的“灰色地带”。现代色谱学（chromatography）已经分析出几十种介乎“黑”与“白”之间的灰色。社会事物（现象）也一样。同样是人，但在“好人”与“坏人”、“英雄”与“败类”之间，存在着难以数计的“各色人等”，远不止“二律”，他们之间也不一定“背反”，恰如“灰色”既不与“黑色”相反，也不与“白色”相反。因此，康德说，“二律背反”这种认识论实际上“掩盖着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忽视它的有限性可能导致方法论上的严重偏差。可惜，

人们常常忘记康德后面这句话。

近几十年来，翻译界在研究中遇到了很多的“二律背反”：有些是非同类属的“二律背反”，如“原语”与“译语”、“聚合”与“组合”、“正说”与“反说”等等；有些则是同类属的“二律背反”，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形合”与“意合”、“描写”与“规定”等等。其中，又以“直译”与“意译”最为典型；这个我下面再谈。因为纠结于“二元化”，翻译界已经在翻译实务与翻译理论上吃了不少苦头：

第一，“二元化”使复杂的命题“过分简单化”（Over-simplified）

“二律背反”以“二元”来归结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可能误导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二元”的基本形态，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纷繁复杂的、往往是更重要的非基本形态。上面提到直译与意译，中外古今翻译界为此而“自我纠结”者，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达几千年。其实，只要摆脱“二元”束缚，对翻译的实际略加考察，就可以发现：翻译活动绝不像非直译即意译（或相反）那么简单；通常的情况是“直译中有意译，意译中又有直译”，而且“直译”与“意译”两者本身也都并不典型；最普遍的办法是“随文阐释”（interpret side by side with the SL）。这种实例可以说俯拾即是。下面是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一句话：

[原语]

The excellency of every art is its intensity, capable of making all disagreeables evaporate from their be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beauty and truth. (1871)（黑体是本文作者标的）

[译语]

任何一种艺术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它与美、与真紧密相连而使种种有失于怡人的成分烟消云散。

很清楚，如果不是将句中的黑体部分灵活意译，同时将非黑体部分基本直译，则根本不能期望能构建起这个句子来。执着于“二元”中的任何“一元”都无法实现双语转换。所谓好的翻译，按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直译意译，圆满调和”，而“圆满调和”则正是对“二元化”的优化解构（Optimized Deconstruction of Dualism），在二元之间的广阔“中间带”寻找最理想的优选项。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就直译成分而言，抑或是就意译成分而言，双语转换中都不存在所谓“对

等”，都只是各种程度、各种方式的解释，就全局而言正是“随文阐释”，功在曲尽其妙。可惜，直到今天，“对等”还是很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头脑中死守的关键词和挥之不去的“标准”！

“归化”与“异化”也是一些中国译论者津津乐道的信条和挥之不去的所谓“文化翻译规范”。其实，文化翻译有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的文化词语概念（或实际所指）大量存在的不是什么“对等”，而只能是“意义代偿”与“文化代偿”，可统称为“文化解释”。例如，汉语“经史子集”翻成英语必须解释为“Chinese classics”，如果不加 Chinese 这个阐释性限制词，则外国人读到 classics 时想到的必然是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汉语中“诗词”是两种东西，到了英语中都成了一个对应词 poetry (poem)，而“对等词”则根本不存在。有一本书将英语的“bottle nose”（土豆鼻）译成了“酒糟鼻”。其实，英语的“酒糟鼻”是“strawberry nose”。这是常见的文化解释中的张冠李戴。文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谈不上一刀切的“二元化规范”，原因是像这样的“规范”压根儿算不上规范。外国人用归化、异化法翻译时，我们更不必跟着他们“归化”、“异化”。比如，一本德译美国小说将美国 hotdog 时而译成“热狗”，时而又叫它“法兰克福腊肠”（frankfurters）；汉译时如法炮制，使中国读者莫名其妙，大可统统译成“热狗”。而且，像“归化”、“异化”这类说法听起来就有西方政治话语的味道。另外，有一点必须顺便澄清，中国文化翻译研究课题发源于佛经翻译（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2005），说现代中国文化翻译研究始于西方译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转向”的影响与号召，与史实不符。我们中的一些人不能为了信奉西方理论，而掩盖中国人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二元化”难免使审视问题绝对化、对立化

由于受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论的局限，在翻译研究界常常出现一些绝对化概念，上面提到的“对等”，就是一个绝对化概念。“对等”排斥相似性（Similarity）、近似性（Approximation）、差异性（Difference）、多变性（Changeability）、兼容性（Compatibility）、多元性（Plurality）和多维性（Multi-dimension），而这些特征恰恰是翻译必须具备的特性。科学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了“自身”（the Self）以外，没有对等的东西，地中海的一公升水并不“对等”于太平洋的一公升水，水中的微量物质和可溶性千差万别。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对等”的鹅卵石。人的思想、概念和社会事物（或现象）更是如此。人文性为人的语言注入了如同人本身一样复杂的差异。英语里说 There are tigers and tigers，前一个 tigers 与后一个 tigers 并不是一回事，犹如汉语里说“有吃人的老虎也有不吃人的老虎”，此虎与彼虎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有情思的人。

绝对化是理论研究中最大的绊脚石。对待西方理论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的西方同行也是在为翻译学的科学化而努力，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然可以供我们借鉴，即所谓“殊途同归”。但即便这样，西方同行的“途”与我们的“途”、西方同行的“归”与我们的“归”也很有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性。例如，在翻译中如何选材、如何对待意义、如何对待语际交流效果、如何对待审美情感以及艺术审美态度与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东西方译者本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文化诉求和不同的价值观论，双方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目前有些研究者“唯西方理论是听、唯西方学说是从”的绝对化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二元化”的认识论还难免使人在审视复杂的事物时陷入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论。上面提到的“唯西方理论独尊”的态度也正是“对立论”的一种表现：将中国的理论与西方理论对立起来，一味追捧西方理论，不屑中国理论，看不到东西方理论二者之间深层的互补互证作用：中国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大体上正是中国的翻译研究者本乎中国传统译论、参照西方译论，又经过自己多年翻译实践的检验，经历了锲而不舍的会通稽考，惨淡经营，发展出来的可贵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我们从“中译翻译文库”的规模和论题深度就可见一斑。

二、翻译界要加强语言之间的互补性研究

多年来，我们非常重视语言差异性研究。这当然是对的，因为语言特色常常表现为语言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通晓语言差异性肯定有助于我们领悟和把握语言特色，有助于提高翻译的技能技巧水平，但在研究差异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语言之间的互补性。

语言之间的互补性是个广义概念。按照上文中提到的本杰明的论述，“可译性”就是语言互补性的明证。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语言互补性涵义比可译性更广，也可以说是对本杰明的可译性内涵的分析性延展。语言为什么可以互补呢？回答是：

- (1) 从根本上说，人类思维与文化经验具有广泛的基本同一性
- (2) 在意义上，人类语言之间存在广泛的意义结构基本同一性和互释性
- (3) 在形式上，人类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特色的形式对应或广泛的功能代偿
- (4) 在话语交流中，人类语言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对应式或功能代偿手段
- (5) 在既无法互释、又找不到对应式及代偿式时，翻译学容许翻译者这个主体发挥自主性，以创新来实现语言互补。翻译中不存在译者不能逾越终而死于词下的“鸿沟”、“天障”、“陷阱”、“死穴”等等。所谓“翻译不

出来”、“不可译”只不过是暂时现象,“激光”与“基因”就是很好的例证。

以上(1)到(4)可以说是翻译中的“见招拆招”,“你”(SL)兵来,“我”(TL)将挡。这里,就译者而言,重要的是代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最重要的无非是,你过得了河,我也过得了河,至于“我”拿什么过河,这完全是“我”这个译者的“主体自主性”的职内之责。总之,一切端赖译者能够勉力作出“交流效果再保证”(the reassurance of effect),也就是说:只要作者能对自己的作品效果作出了效果保证,译者也就能够凭借自己的语言功力据此作出再保证。

下面,我们可以用许多实例来图解语言之间“兵来将挡”、“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先以汉语独特的无主语句(a、b)的英译,及英语独特的虚拟语气句(c、d)的汉译为例:

- (a) 算了吧。(没有主语,不是主语省略句;另如“没办法”、“是我不好”、“稍安勿躁”,等等。“是我不好”不是“我是不好”的倒装)

Forget it. / Let it go. / Just drop it, OK?

- (b) 爱选谁(就)选谁。(主语缺如,还有“爱看不看”、“爱去不去”、“去又怎么样,不去又怎么样?”等等。)

Choose whomever you like. / Everybody has a right to choose the one he likes. / He (We, You, They) can pick up whomever he (we, you, they) likes (like).

- (c) If Jesus Christ were to come today, people would not even crucify him, they would ask him to dinner, and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and make fun of it. (Thomas Carlyle, *Carlyle at His Zenith*)

如果耶稣基督今日大驾光临,人们不会将他钉上十字架,他们会饕以大餐,洗耳恭听他的赐教,然后来一番取笑。

- (d) If the French noblesse had been capable of playing cricket, their chateaux would never have been burnt. (G. M. T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倘若法国贵族大人会打板球,他们的城堡也就不会被付之一炬了!(英语中“cricket”的暗涵义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语言之间的互补性是可译性的基本依据。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双语之间实际上不存在根本无法翻译的概念和表现它们的词、语、句,因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解释——“易语而释”。本杰明认为语言转换的实现有赖于完全摆脱语言形

式外壳的束缚，让两种纯语言在意念上互补相交（1955: 80），他称之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翻译”（1955: 82），就是我们所谓的“**深层翻译**”。语言的表层符号就是**书写系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定视觉结构”，通常较难发现与另一种语言的互补性；而语言的深层则是**思维系统**，摆脱了民族文化的“特定视觉结构”的约束和统摄，不同民族的思维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比较容易在这里呈现、交汇、兼容、互释而显示出来。这也是我们提倡“**深层翻译**”的**理据**。

三、翻译研究应大力倡导科学的理论原创

中国翻译研究界很多人非常强调向西方翻译理论学习，但这样一种倾向很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忽视理论创新。中国翻译学术期刊上的大多数理论论文都是作者对西方理论的个人解释，有些甚至实际上只是一种抓取对方一鳞半爪的“读后感”或“赞美辞”。总之，其基本“模式”（“套路”）是“西方理论 + 中国解读（汉语例解）”。

另一种倾向是标新立异。科学的标新立异当然是可贵的、值得提倡的，因为它既具有创造性，又经得起论证。可惜，中国翻译界的很多标新立异根本经不起论证。此类貌似标新立异，实则大有可以商榷之处的所谓创新，不仅在翻译学，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屡见不鲜。我想在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供大家商讨：

第一，理论创新不能有悖于已经经历过时代的“历练”，并为世人所公认的本学科基本概念、基本常识、基本原理、基本通则、基本规范等等，也就是**创新要立意于继承与发扬**。当然，你可以到处“解构”、到处“消解”、到处“造反”，甚至把整个学科推倒，但你必须经得起充分的科学论证，能拿出你所掌握的充分的“科学新发现的铁证”来。

第二，所谓**经得起科学论证（Scientific Verification）**，指经得起科学的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推论）分析、差异辨析分析、正反验证分析以及历史辩证分析、互文参照分析、实践验证分析。而且，这种种分析都应该避免“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

第三，翻译学是人文科学，应该具有充足的人文性，不必也不能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数理逻辑来论证。这里，根本原因是“人文概念根本上是不能量化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定量分析在人文领域基本上行不通。

第四，翻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翻译学理论万变不离其宗，都应该

指向 (lead to) 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可以很抽象、很思辨、很“纯”，但归根结底，都应该为翻译的高效率、高品质服务。可以预见，即便将来发展出一门“翻译哲学”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这门哲学也必然是指向翻译实践的。德国学者说过一句话，翻成英语是：Translation studies is born for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的天职就是为了翻译)。说得有道理。

说到这里，我要向中国的翻译界推荐一本好书：*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metheus Books, 1998)。该书由 E. D. Klemke 等人合编，书中有很多科学哲学名家如 T. S. 库恩、C. G. 韩普尔和 R. 卡尔纳普等人的重要论述，是西方理论研究者的必读书。我们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是不能不读的。自古以来，华夏人杰地灵，我想，我们的翻译界一旦纠正了偏见，掌握了新知，就一定会在新的征途上取得新的成绩。汉语是近 14 亿人的母语，全世界的人正在期盼中华文化的灿烂复兴。许多国家的翻译界更是渴望读到又好又多的中国典籍和现代文化精品。中国翻译界和翻译研究界恭逢其盛，肩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的职责；我宁愿将这份职责称为“天职”。

四、翻译必须回归美学：翻译研究的美学诉求

翻译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美学结了缘，因为没有一位译者可以不做语言审美就能下笔或开口。即便是出口成章的人，他那过人的“成章之术”也是经他多年“修炼”，获得了语言审美经验积淀的成果。翻译离不开语言审美。下面，我们不妨来做翻译的过程分析。

概括来说，整个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十二项任务，如下所示：

第一阶段 原语分析——

任务 1 语言结构分析 [按语法析出词句结构]

任务 2 语义结构分析 [按结构析出词句意义]

任务 3 语段结构分析 [按语段分布析出段落意义]

任务 4 篇章结构分析 [按篇章结构析出文本整体意义]

任务 5 文化分析 [语言文化内涵及价值判断]

任务 6 修辞分析 [词、句、段、篇的语言审美信息扫描及转换]

任务 7 风格分析 [原语风格信息扫描及转换对策考量]

任务8 词语及文本意涵、意蕴分析[超原语文本分析及转换对策考量]

第二阶段 译语构建——

任务9 语义转换的择善从优[意义的审美优化]

任务10 句式转换的择善从优[句子形式的审美优化]

任务11 句段篇章行文的择善从优[译语叙事逻辑和行文的审美优化]

任务12 译语风格优化[译语文本整体的审美效果考量]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以上十二项任务中只有四项（1—4）与语言学有关，其他八项任务都与语言审美息息相关。因此，翻译学应理所当然地归属于语言美学，成为美学的重要分支。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翻译学隶属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为它只是学好外语的基本手段之一，翻译学“被沦为”语言学的“附庸”，看来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1976年，朱光潜在新版《西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的序言中写道：“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的时代已经到来，翻译学由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翻译学科的时代也已经到来！现在投身于翻译美学研究的中青年才俊和业外的有识之士已经越来越多，翻译美学成果如山花烂漫呈现在学坛、蔚为景观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独立的翻译学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等友军一道，肩并肩迈步学坛，可望成为21世纪上半期中国文科领域最精彩的改革之一！

五、翻译者应该提高自己的语言功力

这是我对中国翻译界从业者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殷切的一个期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言是我们这个行当的工具。我想，翻译业是没有“潜规则”的，如果有，也只有一条：“你必须将工具磨砺成利器”，因为在原文书和电脑面前、在外宾和中国听众面前，除了你自己，除了你的语言功力，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你的忙。很多年来，我们都在呼吁提高翻译质量。在我看来，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请译者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功力——把你的工具磨砺成利器！你手握“利器”之日，也就是你笔下生辉之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CTPC）与中国翻译界的合作渊源已经长达四十年，与我个人之间的情谊也已有三十个春秋。三四十年风雨同舟，确确实实谈得上相濡以沫、守望相助！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许多编辑和领导人员不仅是我们翻

译界同仁在艰苦自持中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扶掖者，而中译在惨淡经营中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以及对翻译研究事业的扶助精神则更使一代又一代的翻译从业者、研究者感怀至深，因而自励图强、自勉弗怠。今值“中译翻译文库”建立之日，谨以拙文奉献，并致以诚挚谢忱，预祝事业更上一层楼！

2011 年元月，农历庚寅年十二月于中国香港

给力翻译与翻译研究

——《中译翻译文库》总序二

谭载喜^①

一

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有一句名言：“无论在语内还是语际，人类彼此间的交流都等同于翻译”^②。这就是说，有语言交流就有翻译，翻译的历史就如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悠久。即使我们不从这种宽泛的，而是从狭义的角

① 谭载喜，男，湖南涟源市人，香港浸会大学翻译课程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翻译学硕士、博士。曾执教于湖南师大、深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历任湖南师大外语系副主任、深圳大学外语系主任、外事处处长。兼任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兼职教授。2009年9月应邀以讲座教授身份赴意大利为国际“奈达翻译学暑期研究学院”（Eugene A. Nida Schoo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讲学。学术兼职包括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多套翻译研究丛书及学术期刊的编委、匿名评审专家。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共三百多万字。曾承担并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广东“九五”省级重点课题1项、校级课题20多项（包括在香港和国内各大学承担的项目）。三部著作先后五次获省市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多篇论文分别在境内外获奖。经常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作会议主旨发言或宣读论文。代表著作包括：《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翻译学》、《翻译研究词典》（主译）、《奈达论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幸运的吉姆》（译著）等。学术论文大都发表于各类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包括 *Meta*、*The Translator*、*Neohelicon*、*Perspectives*、*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Babel*、《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杂志。主要论文包括：“The ‘Chineseness’ vs. ‘Non-Chinese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 ethnoconvergent perspective”、“Towards a whole-person translator education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on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mes”、“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al identities”、“Metaphors on translation”、“Foreig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e role of background, common, shared and mutual knowledges”、“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ranslation in comparison”、《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翻译比喻衍生的译学思索》、《翻译学：新世纪的思索》、《文化对比与翻译》、《必须建立翻译学》、《论翻译学的途径》、《论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试论翻译学》、《翻译学与语义》、《论比较译学》、《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再论翻译学》、《语篇与翻译：论三大关系》、《中西翻译传统的文化烙印》等。

② 原文：“...inside or between languages, human communication equals translation” 详见：Steiner, George.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ird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49）



度来界定翻译的意义，只把翻译所指聚焦在有文字记载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和产品上，无论在中国或西方，翻译也都有着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从“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为了“达其志，通其欲”，而“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的古代，到佛经大规模播散东土的隋唐，到西学东渐的明末清初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建国之初以及文革之后的全方位改革开放，翻译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样，西方文明史的发展，从最初亦步亦趋地模仿希腊文化的古罗马时期，到民族语言、民族国家构建的中世纪，到推动文化再造运动的文艺复兴时期，再到欧洲内部与外部的国与国之间全面交流、交往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也从来都是因为首先有翻译工作者的参与才获得的。一句话，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也好，都离不开翻译的帮助。

在翻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人类关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却往往未能得到应有重视^①。在过往二千多年的发展中，翻译理论研究往往没有脱离“就事论事”的经验论范畴，理论家们关注的核心所在，大都局限在“怎么译”的层面上^②。而对于超出“怎么译”范畴的许多其他问题，如翻译到底是什么？是艺术、技巧、技术，还是科学？翻译的原则、标准是什么？译者的责任是什么？翻译的过程是什么？翻译过程中文本与“人”（作者、译者、读者、委托者、赞助者、出版者、项目组织者等等）的关系是什么？翻译题材与翻译手段、翻译目的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对诸如此类涉及翻译本质的理论问题，人们在经过二千多年发展后的今天，似乎仍然处于继续探索中。或许，由于翻译在本质上不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因而对它的认识也就不能一劳永逸。例如，对于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去解读翻译忠实以及译者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译者和研究者，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即便可能互相对立或排斥，例如，要“神似”不要“形似”，或要“形似”不要“神似”；要“异化翻译”不要“归化翻译”，或要“归化翻译”不要“异化翻译”，等等，彼此却又各有各的道理。因此，我们不可偏执一方，把一方当做翻译的本质所在，而把另一方看做大逆不道，排斥在对翻译本质正确认识的范围之外。

① 参见：谭载喜，2000，《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重印本；第3页）。

② 参见：谭载喜，2004，《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今天、昨天与明天》，《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31页）。

二

这样一来，笔者想要传递的一个思想是：如要正确认识翻译，认识翻译的本质，认识上面提到的关于翻译的所有问题，我们就必须具备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既立足本族思想，又借鉴外来观念；既回望过去，又前瞻未来；既着眼实践，又重视理论；既传承主流意见，又鼓励创新、容许异议。所有这一切，传统的翻译理论没有也无法系统论述，只有在翻译研究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下才能做到。这就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发生在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的事情。

自 20 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在实质上超越传统翻译理论所关注的范围，而迈入更加广阔的、以追求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为发展目标的新时期。正如笔者曾经讨论过的^①，新时期翻译理论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其发展标志在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域较为明显。它主要体现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质”的飞跃上。这里所说的“质”，是就翻译研究的“性质”而言的，指研究界对这个“性质”的认识。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漫长的传统翻译研究时期，虽然西方翻译理论遗产相当丰富，但正如笔者曾多次提到的，千百年以来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随感性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在传统翻译学者的眼里，所谓“翻译研究”即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仅此而已。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机器翻译由梦想和设想变为现实，学者们就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问题。从非科学的、随感性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研究视角，发展到奈达、费道罗夫率先运用科学的、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这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质”的飞跃。翻译研究即因此被稳稳地定位到了语言科学的范围之内。

然而，把翻译研究定位于语言科学，即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并未能真正反映出翻译研究的实质所在。经过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持续研究和探索，西方翻译学术界逐步有了一种明显的共识，即翻译研究不应满足于被当做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而是应当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于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又一次出现“质”的飞跃。催生这第二次飞跃的人物是美籍荷兰翻译理论家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 年，他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题为《翻

① 参见：谭载喜，2004，《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今天、昨天与明天》，《中国翻译》，2004 年第 3 期（第 31—32 页）。